

拍案文丛

别处的家园

尹昌龙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拍案文丛

别处的家园

尹昌龙 著

BI E CHU DE JIA YUAN

广东人民出版社

别处的 家园

柏業文丛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处的家园/尹昌龙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10

(拍案文丛)

ISBN 7-218-03481-0

I. 别… II. 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828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1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3481-0/I·428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MU LU



辑一 媚俗和自娱

现代性：未践之诺	3
“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考察	8
对当前批评的批评	17
媚俗和自娱	23
当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情怀”	28
“文学小狗”的单纯叫声	32
无畏的王朔	35
读解余秋雨	38
在两个十年之间	41
当代文学的学科焦虑	44
理想的文学史框架	46
分享大师	48
“饿死诗人”是大可不必的	52
超文本的轰动	55
自我怜惜的写作	58
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	62

圣地的赤子
优雅而抒情的批评

65
71



辑二 城市的细节

城市的细节	79
文化不仅仅是楼台场馆	82
母语的遭遇	86
香港:文化身份的辨认	89
很近的台北	93
寻找上海	97
从“缺席”到“转世”	100
世纪末的一本“奇书”	104
如何“现代”起来的生命故事	106
因为关怀,所以访问	109
畅销书的文化革命	112
革命故事与文化工业	116
我们没有改变什么	120
难以克服的眩晕	125
“读图时代”的快感旅行	127
炒作的游戏	130
玩出文化来	134
说什么酒,还要文化	137
见证中国	139
30岁的人生平台	142
为荣誉而战	145

· 2 · 11/11/2010



辑三 持续的文化想象

回望激情岁月	153
莺飞草长 花开花落	156
世纪之交的喧哗与躁动	162
文化的回望	171
持续的文化想象	179
面向新世纪的文化准备	182
北大百年：庆祝与反思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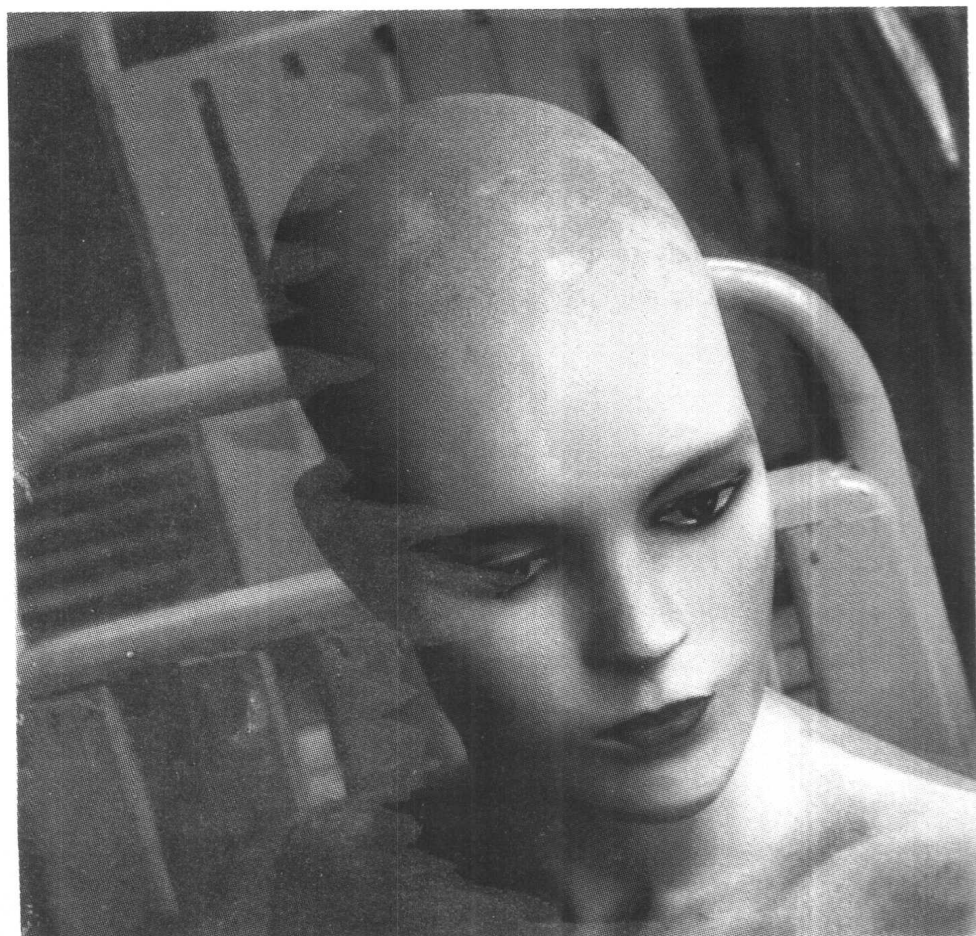
辑四 民间的深圳

民间的深圳	195
文化辩论与身份建构：深圳	
艺术评论的追求	202
另外一种证明：深圳文化 20 年	211
新都市中的新市民	218
别处的家园	225
从深圳开始	228
深圳的简单	231
艺术节，带给深圳什么？	233
大炼“钢铁”的深圳人	236

面向高科技时代的深圳文化	239
关于现代深圳的想象	245
移民运动与现代都市	248
 后 记	 252

辑一

媚俗和自娱





现代性：未践之诺

对“小康社会”的热情的预告，以及对“后现代”冲击的一厢情愿的拥抱，似乎都在强制性地制造一种幻觉，即我们已置身于一个全然的现代化的社会中，需要解决的只是一个新的问题，即现代化之后的问题。而正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我们给已经和即将开始的新的文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后学”式的命名，如“后新时期的文学”，“文学的后现代性”，“后寓言的文学”，“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后人学的文学”等等。

或许正缘于此，我们有些匆忙甚至近乎武断地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施行了某种批评手术，或者夸大两个十年之间的“断裂”之感，或者给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划上一个句号，又或者以文化相对主义为由重新想象一个文学时代，如此等等。而借此所做的种种判断，如启蒙文学的坍塌，“人”的死亡，“现代性”的终结，要么是患了欢快症式的狂舞，要么是一种姿态性的忧郁，而对这些判断所做出的半推半就的迎合行为，都似乎实现着一种告别，一种放弃，一种置换，“现代性”则已被当成完成的工程和过时的梦想了。

今天，当我们要对两个十年之间的中国文学作出一番回顾和清理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也许就是对这些流行的批评话语进行批判式的“再讲述”，在排除了可能的思想干扰之后，重新“进入”20年的文学实践中，把未完成的梦想承担下来，在注视我们背后和心中的“黑暗”的同时，真正实现一种以“现代性”为目标的文化转型。



之所以出现对当前文学的“后现代”式的误诊，固然与外来的文化冲击有关，但同时与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处境的独特性的忽略不无关系。姑且不以经济因素说，我们还远未达到现代化所要求的种种硬指标，就是从文化方面讲，我们还不得不进行以“人文精神”为主题的呼吁，我们还不得不以文学的形式讲述着拯救或救赎的故事，我们还不得不薪传这个世纪之初的某些美好想象，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展示着一个庞大的现代性工程，并按照不停修正着的草图进行复杂的施工。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是对已经过去的 20 年的文学实践抱着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相反，我们会寻找一种被贯穿下来的共同承诺，去承担它，去完善它。这个承诺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

回顾起来，20 年的中国文学似乎都沉浸在一种严肃的热闹中。从这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都目睹了熙熙攘攘的作家群落和密密麻麻的语词森林。文学界像个热闹的大集市，而在这个集市的四周则是各种各样的匆匆上马的文学作坊，“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预言几乎在应验的同时就失效了，因为批量生产的文学著作很快又被冲击着畅销书的排行榜，而批评家们几乎无法回避新的文学实践的挑逗，并在“昔日顽童今何在”的追问下紧赶慢赶。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趋之若鹜的文学行为并不就是在快乐原则的单一支配下的，来这里赶集的人们似乎不只是为了闲逛，集市周围的文学生产和集市之中的挑三捡四的文学消费，几乎都在传达出一种实际的目的，一种文化的需要。而正是目的和需要的加入，使热闹并不像孩子的游戏，相反倒是有了些成年人的挥之不去的沉重和严肃。从这种意义上讲，20 年的文学似乎没有真正的“狂”过或“逸”过，即使是看似“狂逸”的操作，也往往只是表象，而其背后则是一种被遮掩的“深度”。即使是



对“深度”的拆解，也似乎不像罗兰·巴特说过的那种把闹钟拆散了之后便扬长而去的孩童行为，就连“做鬼脸”也像“别有用心”。

当然，文学行为背后的目的往往都有其多种多样的个人性，但如果要从中找寻一种贯穿 20 年的“意识形态”，也不会是勉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热闹背后总会听到窃窃私语，说是算计也好，说是谋划也好，这些私语既然都指向一种共同的文学交流行为，那么它就有可能上升为共同话语或意识形态。如果要提供我们的假设的话，那么“现代性”的诉求可算是一种主流行为，在它的名下出现的文学生产和消费，都可能对“现代性”想象的需求和制造。当然，这种假设并不就是一厢情愿的，说到究竟与我们整个 20 年的社会处境密切相关，那就是中国社会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总动员，从农村向城市被不断推展开来的现代化运动，已经使我们的生活无法与现代化无关了。奔向富裕的朴素愿望，被日益强调的效益考核，以及对更新更好的现代生活的固执的向往，都在讲述着一种现代性的诉求。而这些诉求一旦上升到价值层面，就成了一种被意识到的文化冲动，为此所作的种种设计，种种引导，都成为现代性意义工程的重要环节。不仅如此，文化的设计还从逻辑层面向历史层面扩展，于是，以现代性为主题的世纪叙事就演变成一种更为广大的意识形态。不妨这样设想，如果是不出于新时期以来 20 年所积累或成长着的现代性诉求，那么我们至今还无法实现对“百年中国”的完整想象，或者即使有了个勉强的时间框架，而其内部也会是散乱不堪的意义零件。

正是在“现代性”追求的主题下，两个十年之间的中国文学获得了相对完整的统一性。由此我们会对这个年代连绵不已的文学运动找到有内在联系的解释。如当年的改革文



学，实际上是以文学方式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行想象，而改革文学的文本中所出现的产值数据、政府措施、厂长人格，几乎可以说是经济改革进程在文学中的直接书写，而人物话语中对效率的最初评述，则直接暗含着经济现代化的计算尺度。至于 80 年代影响甚广的寻根文学，则直接指认着一种以现代化为背景的文化主题，一方面是文化从心理观念层面对现代化进程的调适，另一方面是文化从社会道德层面对现代化冲动的制衡；一方面是文化向世界进程靠拢而寻求普遍的现代性模式，另一方面是文化民族历史回溯而“发现”独特的现代性体验，等等。寻根文学的昌盛可以说是现代化冲击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心理效果，它既加强了现代性诉求，又使这种诉求变得复杂而深刻。而寻根文学对现代性的文化想象，无论是“防御性”还是“战略性”的，都已经成为这个后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设计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而说到两个十年之间文学自身的形式革命，都同样可以寻找到一种现代性的冲动。其实，现代性诉求进入新时期的文学实践，在其一开始就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暧昧影响。西方“现代派”文学在 20 年前的东移，首先是在形式革命中实现的，像新时期文学天空中最早放飞的“现代派”风筝，是有强烈的“形式”目的的，即从文学技巧层面实现着一种朴素的模仿，只是到了后来，“现代派”文学才引发出永不衰竭的革命冲动，这就是：不停歇地对“新”的话语和“新”的流派的追求。大约在 10 年前，批评家黄子平一句戏言“新时期文学这只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停下来撒尿的时间都没有”，真可谓是对这种文学创新行为的生动表述。当这些创新行为在竞相表达一种现代立场和现代身份的时候，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倒是真的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了某种一致的焦虑，这就是从新到新，而惟恐不够现代。丹尼



尔·贝尔就曾经说过这种现代人的求新行为，他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看到了这种因求新而来的“超越”狂想：“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地扩张”；“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这些无止境的超越行为便诞生出连绵不断的现代文艺流派。而 20 年间中国文学的种种革新的口号与思潮，都能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找寻到某种美学依据。

在 20 年的文学实践之后，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近乎矛盾的心理效果，一方面是现代性诉求所带来的不停歇的文学创新冲动，另一方面是这种惟新是举的追求产生的疲惫；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加入所带来的沉重，另一方面是这种沉重在一个已经到来的消费和闲适时代所遭遇的消解。这使得我们文学在 20 年后的今天变得更加暧昧不明，当然，这既可以认为是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必然过程，也可以认为是现代性企图被削弱之后所带来的混乱的叙事。

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处在不断完善之中，那么对现代性的想象和设计就会是中国文学无法逃避的主题。当哈贝马斯在西方世界宣称现代性是个尚未完成的工程时，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现代性工程还只是处在“初级阶段”，或者说只是开始。与这个总的主题相一致，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不会是对新时期以来 20 年的文学实践的简单告别，这种割不断的联系就在于持续不断的现代性想象。当然，这种想象会在不断修正之中，它会因为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造成的不同的处境而作出种种话语上的调整，但是，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倾向，这一点似乎应该是我们的共识。



“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考察

——兼论“新都市文学”的现代性选择

自《特区文学》推出“新都市文学”的口号以来，有关“新都市文学”的话语和想象已经出现于一系列的批评文章中，这些文章尽管立论各有不同，但似乎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出了一种话语努力——为正处于实践中的“新都市文学”寻求一种存在的合法性。有意味的是，这种合法性并不能单单从批评的话语实践中产生，它需要来源于某种似乎已成共识的元话语的支持。这个元话语是什么呢？从目前所见的“新都市文学”的批评文章来看，大体上可以说是“现代性”话语，这不光体现在所谓的“现代意识”中，也体现在所谓的“现代文学语境”中，或者还体现在关于“都市文化”的特定陈述中，但无论如何，这些批评实践都意在把“新都市文学”引入“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并通过这种叙述来证明其开放性、超前性、当代性和普遍性。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都市文学”运动中相对超前的批评实践，为之带来了非地域性的视界，并与当代中国以至世界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现代性”问题挂靠起来。从世界范围看，像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从“公共空间”入手探求现代性的特征，像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从近现代中国报业的话语运作历史考察“现代性”的发生，等等，都是对“现代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新都市文学”的批评实践能够自觉地导向“现代性”这一人类共同的问题（无论是就“现代性”的完成或尚未完成而言），这都同时表明了一种知识上的深度或高度。据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对“现代性”话语资源的有效调用，将使“新都市文学”的话语生产达到一种令人炫目的规模效应，以至于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智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许正因为“现代性”问题对于“新都市文学”的元初意义，所以有必要先对“现代性”问题作个基本的考察。

一、“现代性”话语的遭遇：西方的挑战

人们在考察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时，始终不会忘记来自于“现代性”叙事的宏伟的构成力量，这一叙事包含着一系列的陈述，如历史进化和进步学说，个人主义伦理，组织和效率理论，主体性神话，等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它向全球的扩张，使这种“现代性”叙事被进一步合法化了，更有甚者，“现代性”叙事因此而成为一种权力化的知识制度，并且直接指认着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普遍主义。

然而，在进入 20 世纪的后期，西方的“现代性”叙事首先面临着来自西方世界内部的瓦解力量。这典型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性”叙事事实上是一种霸权话语，特别是当“现代性”叙事成为处于最高等级的意识形态时，就会成为权力的工具；在后殖民主义看来，“现代性”叙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并行不悖，一旦西方的“现代性”叙事被认定为普遍的真理时，实际也就认定了一种普遍的西方立场和西方尺度。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引起较大范围的同情理解，固然说明了“现代性”叙事遭受着瓦解的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叙事彻底终结。相反，来自于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诘难为“现代性”叙事的知识重建提供了一种当代的可能性，这就是，“现代性”将被看成是尚未完成的知识过程，它需要在削减权力企



图的对话中达成一种相对有效的共识。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这样两个说法，一是在“现代性”之后探求“后现代性”的发生，二是在中国的传统中寻找本已发生的现代历史；但至少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为“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崭新的纬度，这种纬度或者是知识的、逻辑的，或者是民族的、历史的。

二、“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的处境

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人类”作为具有超越性的主体，曾经一再被谈及。然而值得人们警惕的是，“人类”一词往往在“现代性”叙事的抽象中变为含义不定的能指，更进一步讲，词的意义往往与言说者的立场相关，正因为“现代性”叙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西方的形式讲述着，所以其中的“人类”所指为何就值得注意了。这一点就像当代批评家黄子平说的那样：“当人们使用像‘人类’这样的高度抽象的字眼时一定要格外慎重小心，倘若如此众多的中国人都还体验不到这种‘形而上’的高度的‘人类痛苦’，则这‘人类’只是暗含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欧洲人’的扩大化罢了。”

这种对“人类”一词普遍性的质疑，就意在反对一种抽象，一种与特定的文化、历史、社会的“剥离”。由此，当代中国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就首先转向了对“我们”的讨论，即确定作为讨论者的“我们”的身份。而“我们”的身份则来源于一种共同的“中国处境”，这其中包括历史的、传统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诸多因素。正是从这种讨论中，“现代性”问题获得了与“中国处境”相一致的新视野。福柯曾经说过“话语讲述的年代”和“讲述话语的年代”的区别，实际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区别，即“话语讲述的语境”和“讲述话语的语境”的区别。“我们”在这个时